



红河学院
HONGHE UNIVERSITY
学术文库丛书

张爱玲 改写改译作品研究

ZHANGAILING
GAIXIE GAIYI ZUOPIN YANJIU

布小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术文库丛书

张爱玲 改写改译作品研究

ZHANGAILING
GAIXIE GAIFY ZHUOPIN YANJIU

布小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改写改译作品研究 / 布小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2585 - 4

I. ①张… II. ①布…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16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淑蕾
特约编辑 许继起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红河学院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 任 甘雪春

副主任 安学斌

委 员	陈 灿	彭 强	田志勇	张灿邦	张平海
	张永杰	何 斌	马洪波	杨六金	刘 卫
	吴伏家	刘艳红	路 伟	龙庆华	洪维强
	王 全	杨文伟	雷明珍	张 谛	梁 健
	孙玉方	徐绍坤			

《红河学院学术文库》总序

红河学院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蒙自市，南部与越南接壤。2003年升本以来，学校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对自身发展定位的深入思考，完成了从专科到本科、从师范到综合的“两个转变”，实现了由千人大学向万人大学、由外延扩大到内涵发展的“两大跨越”，走出了一条自我完善、不断创新的发展道路。在转变和跨越过程中，学校把服务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桥头堡建设、服务于培养合格人才作为自己崇高的核心使命，确立了“立足红河，服务云南，辐射东南亚、南亚的较高水平的区域性、国际化的地方综合大学”的办学定位，凸显了“地方性、民族性、国际化”的办学特色，目前正在为高水平的国门大学建设而努力探索、开拓进取。

近年来，学校结合区位优势 and 独特环境，整合资源和各方力量，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是红河学院人坚持学术真理、崇尚学术创新，孜孜以求的积累。为更好地鼓励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促进学校深入开展科学研究，激励广大教师多出高水平成果和支持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特设立“红河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对反映时代前沿及热点问题、凸显学校办学特色、充实学校内涵建设等方面的专著进行专项资助，并以《红河学院学术文库》的形式出版。

学术文库凸显了学校特色化办学的初步成果。红河学院深入实施“地方性、民族性、国际化”特色发展战略，着力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的学科建设体系，不断加大力度推进特色学科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强化了特色成果意识。学术文库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校的办学特色，反映了我校学者在研究领域关

注地方发展、关注民族文化发展、关注边境和谐发展的胸怀和视阈。

学术文库体现了学校力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能力和担当。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使命和责任。学术文库的出版,集中展现了我校教师将科研成果服务于云南“两强一堡”建设、服务于推动边疆民族文化繁荣、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助推地方工农业生产、加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追求和担当,进一步为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和谐贡献智慧和力量。

学术文库反映了我校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攀登科研高峰的毅力和信心。我校学者克服了在边疆办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困难,发扬了蛰居书斋,沉潜学问的治学精神。这批成果是他们深入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做访谈、深入田间地头做调查、埋头书斋查资料、埋头实验室做研究等辛勤耕耘的成果。在交通不畅、语言不通、信息缺乏、团队力量薄弱、实验室条件艰苦等不利条件下,学者们摒弃了“学术风气浮躁,科学精神失落,学术品格缺失”的陋习,本着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学术负责的担当和虔诚,展现了追求学术真理、恪守学术道德的学术品格。

本次得到学校全额或部分资助并入选文库的著作涵盖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的七部专著,是对我校学术研究水平的一次检阅。尽管未能深入到更多的学科领域,但我们会以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创造和进步中不断进行文化遗产和科技创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气质勇攀科学高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对学术崇高境界的景仰、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身的天分与努力造就了一位位学术大师。红河学院人或许不敢轻言“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但我们有理由坚信:学校所有热爱科学研究的广大师生一定能继承发扬过去我们在探索路上沉淀的办学精神,积蓄力量、敢于追梦,并为努力实现“国门大学”建设的梦想而奋勇前行。当然,《红河学院学术文库》建设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帮助我们共同推动更多学术精品的出版。

甘雪春

2013年10月

序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空间的开拓

陈方竞

这部论著是布小继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定稿的。我收到论著的电子文本，是今年春节前夕，我父亲病危，尽管奔波，殚精竭虑，深夜难以入眠之时，打开电脑，仍然被论著的文字所抓住，不时产生阅读快感。老实说，近些年，这样的阅读快感并不多。

读着小继的论著，脑子里努力搜寻着他留给我的并不十分清晰的印象，以使文字与他的言谈举止、思维特征、情感表达方式等，能够叠合，以进入他的心灵，增强文字的力度，但一切又仿佛有些徒劳，仅有碎片，且转瞬即逝……在当下严重匮乏“自主性”的中国社会，“被”这个字分外引人注目，也横行无忌，包括清贫自守的同行间。我与布小继的师生之缘，即多少有些如此。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只能通过邮件传递枯燥的文字，以求变“被动”为“主动”。小继是我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是我主动提出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我们是经历较多磨难的一代，人到中年，跻身学界，摸爬滚打，“一步一血痕”，从而建立起从事学术研究的“感觉”与“方式”——我以为，这是我可以与学生一起完成一段“学术历练”最重要的“资源”，显而易见，这需要“心”与“心”的交流，哪怕仅仅是“耳濡目染”。

但我之所以提出不再带博士生，原因又不仅仅在于此。这又是与小继的博士论文即这本书给我的“冲击”直接相关的——我从中看到了自己几乎无法改变的局限。

选择张爱玲“改写改译”作品展开研究，正像博士论文评审专家所说：“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因为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前人成果，所以原始资料的收集解读，思考目标的设定细

分,思路的选择调整,行文表述的方式方法等等,便都不是那么容易了。特别是该选题的论域,具有跨语种、跨文体、跨文化、跨时代、跨地域性质,因而对作者的研究能力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涉猎这方面的问题。即便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大多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认为,这一评价准确而中肯,但这不仅是“学术勇气”的问题,“少有人涉猎”、大多取“回避的态度”的根本原因,是年龄较长的一代研究者包括张爱玲研究专家,与后继者之间“知识结构”上的差距,其中,最重要的是外语水平,这是“跨语种”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就我而言,出生和成长于“北京之为世界革命中心”的那个时代,初中学的是“俄语”,读高中时,中苏关系破裂,又学“英语”,1978年大学刚恢复,外语师资奇缺,找了几个伪满时读过书的人教“日语”,三个语种浮光掠影,知识结构就像共和国历史一样,百孔千疮。小继出生在“文革”后期,他之能够如此娴熟地运用域外语种,并进入研究状态,可以想见所付出的努力。这对于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论著触动我的,还有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我近二十年来带研究生,有一条不明确的“潜规则”:不愿意招收“理论”出身或者喜好摆弄“理论”的学生。这种近乎本能的厌恶,可能与我们这代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理论”的愚弄相关,自幼曾经虔诚地相信过“共产主义”,却难以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首歌),后来又不得不信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甘愿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青春和岁月就这样祭奠给了“理论”:“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①,所以,时至今日,对于加以各类理论包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说,不再会盲从。这也就是1980年我读到歌德的“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有痛彻心扉的感应的原因。在学科领域,经历了1985年的“方法论”热,不久就感到有些虚妄,印象深的还有“现代性”,也是理论先行,据说是

^① 《热风·即小见大》,《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又见《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75页。

“包打一切”的灵丹妙药，喧嚣一时……所以，碰到各种以“主义”开道的论著，我往往退避三舍。在《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所写“自序”中，针对这一倾向的研究说：“满足并局限于有限的文学史料（不愿也不屑于去做对史料的发掘、考证、鉴别这类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引进并借助于与研究对象貌似神异的所谓理论与方法去进行意义翻‘新’的研究，主张‘强化理论意识，突破实证研究’，‘把事实的证明变为意义的阐释，把史料价值提升为思想价值’，由其说法新颖，为编辑喜好，于是那些无视以至背离‘史实’而横扫20世纪的鸿篇大论拥拥挤挤而来。”认为这是“学科研究发生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①。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说这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②，1929年他针对革命文学倡导，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③感受和接近研究对象的生命状态，直面研究对象的生命体验，是鲁迅作品给我的启悟。因此，我在学术研究中史料更为敏感，看重生命形态的复杂性。

但是，这些年我招收的一些研究生，也多偏好借一些时兴的理论包装写文章，改变这种靠理论翻“新”求“异”的倾向，往往成为我带他们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小继开始时也多少存在这种倾向。应该说，在研究方法的差异上，我们之间是有所博弈的，他博士论文最终选择了张爱玲，“以张爱玲作品的完成和发表时间为顺序，选取极具代表性的改写改译作品进行论述”；把重点（也是“难点”）放到“资料收集”上，“文本细读和文本比较”贯穿论著始终，在这方面，第二章最为精彩，如评审专家所说：“作者对《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

① 拙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②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9页。

③ 《译文序跋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2页。

等对应作品的改写改译所作的文本细读以及提炼出来的理论观点，颇有原创性。”

我主张“回到现场，触摸历史”和“立足于‘感觉’的研究与写作方式”，这贯穿了我的文学史研究，但是，如果把由此而建立起的“重在描述而非论述”的学术文体推到极端，一概排斥理论及其方法的借鉴，会不会给自己的研究带来某种遮蔽呢？这是我读小继这部论著突出感受到的。

应该承认，小继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论著的不少章节可见他理性透视眼光的独到，以及由此形成的分析与概括能力。如第一章通过分析“张爱玲的前期文化观”做出的三方面概括，有理有据，切中肯綮，令人叹服，这为全书的阐释奠定了基础。又如文字量最多、写得最为充实的第二章，通过《秧歌》“英文版”与“中文版”的比较分析，认为二者存在着“文本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差异；进而借助“互文性”理论与方法深化，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他的文本。文本与传统、文本与文本之间是流动的，不会确切地停留在某个固定的边界，其结构上有非确定性。”具体到张爱玲的《秧歌》，“互文性还指作家、接受者与文本形成的对话关系”，由此展开《秧歌》两种版本细致对照与比较，并引入反响材料，提出：“对故事文本的借用与改写，……提供了对土地改革的另一种理解”；同时，又可见在“中国农村这个大语境下，《秧歌》所描述的系列事件有其发生的现实可能”的。研究对象在“互文性”考察中，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深化。

再如，第二章中 *Stale Mates*（*Stale Mates* 的英文副题为“A Short Story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可译为“一个爱情莅临中国时发生的短篇故事”）与《五四遗事》比较一节，借助刘禾《跨语际实践》的一些理论观点，从“语际文化差异”和“话语策略和叙事控制”两个方面展开，深入辨析了张爱玲的思考是如何在两种语言间穿梭，从而触摸她的“五四”情结，提出：“一方面，张爱玲少时起就阅读了不少‘五四’新文学作品，对这一代作家的了解逐渐深入；另一方面，步入文坛后又时刻感受着来自他们中的左翼的压力。其‘五四’情结也因之带有了某种复杂性、含混性和不确定性。既喜欢某些‘五四’

作家的作品，可以从中获得乐趣、得到愉悦和美的感化，又不能摆脱当时文化环境的影响，以‘本能的起反感’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样的分析与认识，是可以给人以启示的。

其次，我虽然细致阅读过张爱玲《传奇》中的一些作品，记得当时读得很投入，却从没有做过研究，原因一者是，我难以形成对抗战背景下涵盖不同区域的文学的整体感受，二者，《传奇》后张爱玲写的作品难以激起我像读《传奇》那样的阅读欲望，这是与我的鲁迅研究相关的。

多年前读张爱玲《传奇》中的小说，我切实感到，她在一些方面是接近鲁迅的，这不是在题材上的，而是在人性透视上。《金锁记》一层一层剥开包裹在普通人身上的外衣，透视出人与人之间正经中的虚伪，温情中的邪恶，直至剥得一丝不挂，她还是那么不动声色，冷静到不能再冷静，她觉得人就是这样的，人生本来不过如此，周而复始，岁岁年年，祖祖辈辈。这带给我们的震撼，是接近我们读《狂人日记》从“仁义道德”中看出“吃人”。但较之鲁迅，又可见她身上少了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承担”：如《狂人日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又如贯穿《阿Q正传》的“怒”其不争中的“哀”其不幸的悲悯情怀。而在张爱玲人性透视的作品中，所暴露的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弱点，是“别人”的，是那个与她不相干的冷酷社会的，而不是她自己身上的腐肉和伤疤，因此，读她的作品很难引起痛楚，难以感受到她与被暴露的对象之间有什么“肉搏”。我觉得，“承担”之不足，甚至缺失，对于认识张爱玲的创作生命，特别是她1952年离开大陆后的创作，是至为关键的。

张爱玲后期创作的生命力是否衰竭，大陆的研究者较少涉略，这与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直接相关，即使是近年来她在海外创作的作品陆续出版，研究者对此也是各执一词，难以统一，反映了认识这个问题特有的难度。布小继选择“改写改译”这一为研究者多难以胜任的领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主要体现在论著的第四章。该章集中围绕《金锁记》1949年后的“改写改译”展开，认为这是张爱玲以此“打入英语世界”的一次“失败的探索”。在小继看来，“中西文化背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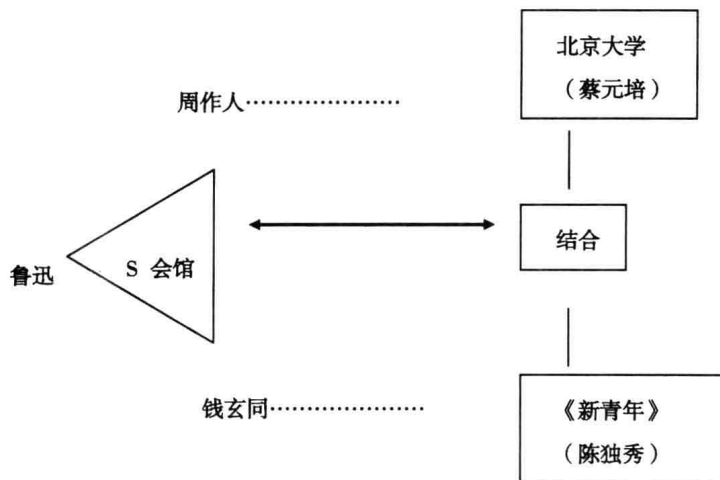
巨大差异”，“故事不合乎欧美人的审美观”，以及“创作观念与美国出版界的冲突和悖逆”，是“失败”的客观原因，论著着力探讨了《金锁记》不断“改写改译”主观上的偏失（如“对前期创作理念的反动”等），为适应欧美阅读市场和读者口味，发生“文化心态的调整与寻求出路的妥协”，这致使“一个表现封建家庭制度中的性压抑者如何充分彰显‘人性恶’的故事，改变为一个封建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如何挣扎和沉沦的故事”，原本塑造十分成功的曹七巧，“改写改译”后“身上的疯狂和魔性荡然无存，尖锐和偏激被褪去，显得更加平实、自然”。所以，论著在“结语”中做出这样的论断：“张爱玲后期的创作生命力不断呈现出衰竭的态势”——“《多少恨》显得俗滥而几乎不被作家记起，《赤地之恋》失败自不待言，《重访边城》更像老年人的叨叨絮语、自说自话，锋芒尽失，《金锁记》越改写改译越陷入迎合读者之迷途，文本原有的内涵和意义却流失了。”

在前面的介绍与分析中，不难看到，论著的每一个论题的提出，每一个论证的推进，所付出的劳动之巨大难以想象，他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掷进去了，其间的紧张，焦灼，沮丧，食无味，睡不安，殚思极虑，非亲历者是难以体会到的。这使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一个有过几十年艰难人生历练的“西南汉子”，他的憨厚、热情、执著与顽强的影像，在我眼前颖然而现：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短暂“相聚”——2009年9月25日我去成都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他从昆明连夜赶来，我下午六点起飞的飞机，延误至半夜一点多才落在双流，机场方面的原因，又滞留机舱一个半小时，已经极度困乏的我没想到布小继（还有李直飞）还在机场等候，安顿下来，已至凌晨，通过会议期间的攀谈，会后又逗留一天的接触，我意识到他选择的论题的难度，又对他能完成这样一个论题增强了信心。

读这部论著，在受到感动的同时，我也感到了“吃力”（如前所述，这与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式带来的“遮蔽”与“限制”不无关系），感到全书的论述过于“硬”了，整体阐释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么，这是怎么产生的呢？粘着题目走，或者说，思考与研究被“改写改译”这个先在的认定所囿，只能局限在这个有限空间中被动地寻找论证思路与材料，虽然局部一些章节写得较为精彩，却受制

于整体格局而难以实现自我超越。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我想到写《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时，开始时也是被设定的“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牵着走，亦步亦趋，十分艰辛，真正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在不断与研究对象磨合中，一个“研究与阐释框架”的建立，如图所示：



在新文化、新文学倡导期“多重对话”的凸现，激活了全书的写作。

实际上，小继的全部思考与研究在开拓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空间，论著切入了这个空间的本质特征，即中国现代文学较之古代文学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它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会中形成的，是在人类的整个世界中建构起来的，在这个世界中，域外文学（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对域外世界发生影响的过程，小继论著中一再谈到的“双语创作”现象，是在这个空间中自然萌生的，是中国与世界之间双向影响与流动的典型体现。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双语创作”的先行者之一，在这一空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论著虽然着眼她的作品的“改写改译”展开研究，认为“凡是改译作品，几乎都离不开改写，也就是说，改译与改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她的《金锁记》与 *The Rouge of the North*，文本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改写改译并存”，实际上是考察了她为中国现代文学之进入“英语世界”付诸的终其一生的努力。试想，如果论著能够立足于“双语创作”

的空间展开，使张爱玲“打入英语世界的努力”获得相对独立性，那么，即使是她自译为 *The Golden Cangue* 这部英语作品，尽管与《金锁记》“文本距离极小”，也不能视为“完全忠实的翻译”，而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更进一步，把张爱玲的全部创作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双向影响与流动的典型体现”，以 1952 年她离开大陆为界，来思考与认识她的所谓“改写改译”作品，在“汉语世界”与“英语世界”的“分途发展”与“互动效应”，是否能够在研究上变被动为主动？研究对象原本具有的潜在价值和意义是否能够得到真正彰显？

我对小继今后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热望，相信他能实现自我超越。

2013 年 3 月 26 日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原因、目的与学术价值	(1)
二、研究现状	(3)
三、研究对象、方法	(7)
第一章 改写改译的尝试之作	(10)
第一节 从 <i>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i> 、 <i>Still Alive</i> 到《更衣记》、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尝试中的考量	(11)
一、改写改译部分的文本比较	(13)
二、思维习惯和文化立场的调整	(18)
第二节 <i>Demons and Fairies</i> 与《中国人的宗教》：前期文化观 ...	(22)
一、改写改译部分文本比较	(23)
二、尝试之作的读者观	(25)
三、张爱玲的前期文化观	(28)
第二章 打入英语世界的努力	(38)
第一节 <i>The Rice Sprout Song</i> 与《秧歌》：文本的互文性	(38)
一、两个版本的内容比较分析	(38)
二、英文版与中文版：文本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46)
三、《秧歌》中英文版本的互文性考察	(51)
第二节 《赤地之恋》与 <i>Naked Earth</i> ：为政治而艺术	(55)
一、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分析	(55)
二、由二文讽刺艺术之比较看张爱玲的焦虑	(60)
三、艺术追求和艺术境界的差异	(66)

第三节	<i>Stale Mates</i> 与《五四遗事》：也看张爱玲的“五四”	（70）
一、	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	（71）
二、	语际文化差异的考量	（74）
三、	话语策略和叙事控制	（77）
四、	“五四”情结及其诗意消解	（82）
第四节	<i>A Return to the Frontier</i> 与《重访边城》：在主流之外	（85）
一、	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	（86）
二、	介入意识形态	（90）
三、	美学观：力的锋芒与细节的“和美畅快”	（94）
四、	主流文化边缘的游走	（97）
第五节	<i>The Spying</i> 与《色，戒》：言说的处境与悖论	（100）
一、	<i>The Spying</i> 与《色，戒》的文本异同	（101）
二、	言说的处境与悖论	（104）
三、	打入英语世界努力的终结	（109）
第三章	角色和话语的转向	（111）
第一节	《不了情》与《多少恨》：角色的转向	（111）
一、	两种文体的文本比较	（111）
二、	情节与话语的通俗变奏	（116）
三、	戏剧剧本的美学追求	（122）
第二节	《十八春》与《半生缘》：从取悦政治到回归艺术	（128）
一、	二文文本比较	（128）
二、	文本叙事分析	（134）
三、	改写的动机、艺术目的和效果	（137）
第四章	艰难的探索：有关《金锁记》	（142）
第一节	《金锁记》改写改译的曲折历程	（142）
一、	改写改译的曲折历程	（145）
二、	曲折历程的原因分析	（147）
第二节	从《金锁记》到 <i>The Rouge of the North</i> ：调整与妥协	（154）
一、	《金锁记》与 <i>The Rouge of the North</i> 的文本比较	（154）

二、文化心态的调整与寻求出路的妥协	(159)
第三节 《金锁记》· <i>The Rouge of the North</i> · 《怨女》:	
从绚烂到平淡	(165)
一、 <i>The Rouge of the North</i> 与《怨女》: 改写文本间的距离 ...	(165)
二、文本的时空印象与人物区隔	(175)
三、文本的风格变异	(180)
结语	(185)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203)